

英国政局是否正在“日本化”？

复旦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朱联璧

10月25日，英国前首相特拉斯发表讲话，称短短的执政时间使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确信”英国需要大胆的政策改变。而新首相苏纳克接任后即表示，将纠正前政府的错误。

在有迹象显示英国经济已陷入衰退，“脱欧”后遗症逐步显现的当下，苏纳克能否避免重演特拉斯的命运？英国政局能否找回曾经的稳定性？本期“论坛”特请专家解读。



朱联璧

——编者

保守党及时止损

问：英国六年来出现五任首相，匆匆换人不利于政治稳定，保守党为何快速抛弃特拉斯？

答：特拉斯执政基础弱、个人能力弱，以及时局严峻这三个问题自她上任之初就表现无疑，这也是缘何她下台一事对英国人来说算是情理之中。如果留意特拉斯在宣布辞职的演说中的神情，会发现她整体而言较为轻松，颇有如释重负之感，与特蕾莎·梅宣布离任时泪眼婆娑、心有不甘形成了鲜明对比。或许，她自己也对无法坐稳首相大位这件事有所预期。

如果把视线往前移，有个值得留意的细节。9月6日，当前首相鲍里斯·约翰逊发表离任演说时，自比作为两度出任古罗马执政官的辛辛纳图斯。当时就有英国媒体人指出，以约翰逊对古典文献的熟悉程度，他自比辛辛纳图斯就意味着他很可能卷土重来。特拉斯宣布辞任首相后，约翰逊匆匆结束度假回国，也印证了他尝试重回政治舞台中央的意图。考虑到特拉斯和约翰逊私交甚笃，以及约翰逊在党内仍有大批支持者，特拉斯应该也能明白，即便经历了一场流程完整的党内推选，耗时一个半月艰难获得了首相职位，但面对随时可能杀个

回马枪的前任上司，她的角色是过渡性的。即便只是短暂出任首相，但对未满50岁的特拉斯而言，辞职既可以摆脱难以解决的困局，也不妨碍她获得前首相的名声和待遇。未来还有无数显性和隐性的利益等待着她。

换言之，与其说是保守党快速抛弃了特拉斯，不如说是保守党高层发现过渡性人物产生了惊人的破坏力之后，选择了以最快速度止损。对于内阁制而非总统制的国家来说，通过推荐新的党领导人的方式来稳住执政党的地位，是常见的应对方式。英国议会运作的根本理念是“众人之事众人议”，政府的关键决策也都是不同形式的集体决策的结果。首相理论上只是一党在下院最重要的领袖，帮助本党的议案和政策生效，其中最重要的是与经济有关的决策。如果一党之内有更适合的人选来扮演这种领袖的角色，能团结党内尽可能多的议员，帮助推行议案和政策，进而避免重开大选，对执政党来说，更换党首无疑是更低成本的巩固统治的手段。在多数情况下，首相的凝聚力、合法性和判断力比对其具体业务的处理能力更重要。毕竟优秀的士兵不一定是好的将领，反之亦然。

“脱欧”系动荡根源

问：相比于过往，英国政坛的稳定性似乎有所下降，原因何在？

答：特拉斯的辞职确实给外界留下了英国政府首脑更替愈发频繁的印象，实际上却不尽然。自2016年英国“脱欧”导致戴维·卡梅伦辞职以来，英国人民已经见证了梅、约翰逊和特拉斯的上台与下野。但是，除了特拉斯之外，梅和约翰逊的任期都在三年又一个月左右，并不能算特别短。

英国经历了20世纪60至70年代的经济和社会动荡引发的首相和执政党频繁更迭之后，到1979年迎来了玛格丽特·撒切尔上台。撒切尔上台之初同样面临了执政危机，但她不仅渡过难关，还引领了一个首相任期

相对较长的时代。从撒切尔上台到卡梅伦下台这35年间，除了戈登·布朗之外的四位首相中，有两位的任期超过十年，有两位超过六年。相比之下，尽管英国人今年见证了七周内出现三任首相的极端情况，但只要没有提前举行大选，保守党的执政地位并不会被撼动。

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无疑是这一轮英国政坛动荡的根源。历任首相所领导的内阁面对政治、经济和社会领域的困局所采取的应对措施均无法满足民众的需求。梅下台表现出英国议会和政府高层无法就“脱欧”方案形成共识。约翰逊下台则是在“脱欧”和新冠疫情的共同冲击下，

英国出现的高通胀、高物价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加之他的个人行为受到争议，最终使得内阁阁员众叛亲离，被迫辞职。特拉斯上台后提出的解决方案不仅没有平复英国经济领域的动荡，反而带来了严重的负面效果，直接导致她成为了英国历史以来任期最短的首相。

这些危机难以化解的原因之一，是保守党的意识形态强调政府要尽量减少干预，而在“脱欧”和新冠疫情这样的重大转折出现后，政府如果不推进党内、党外和与国际社会的合作，不采取干预性措施，依然任由市场和社会开展竞争，那么由重大转折所导致的危机就很难得到妥善解决。因此，保守党的意识形态和政府应该采取的措施之间存在的鸿沟，也限制了执政者所拥有的政策选项。

苏纳克前路多艰

问：苏纳克出任新首相后，能否阻止英国政府更迭逐渐“日本化”？

答：如果说英国政府任期相对较长真的是一种“传统”，那么这种传统出现的时间非但不长，而且也有偶然性。是否要回归这种“传统”，更大程度上是取决于英国新任首相苏纳克是否能如预期那样团结全党并解决困局。鉴于英国最迟在2025年1月就要进行大选，即便苏纳克有能力坐稳相位，15个月后的也要经历大选的考验。他的表现能否满足民众预期？目前尚有不确定性。

近期出版的《经济学家》杂志称呼英国的现状为“英大利”(Britaly)，意指两国都出现了政府高层频繁换人的情况。这种局面确实很容易让人联想起日本政坛在二战之后频繁更换首相的情况。不过，英意日三国情况各有不同。意大利的高层变动与该国政治分权层次多且复杂有关。若以实现“众人之事众人议”的目标来看，意大利人不会认为政府上层的更换是什么负面现象。就日本的情况而言，战后有不少首相的任期很短，但与之并行的是自民党对权力

的长期垄断。自民党内更换领导人有时是派系斗争的结果，但并未破坏自民党对权力的垄断。

与其说是英国政治的“日本化”或“意大利化”，不如说是保守党在面临危机时依然采取了“应换尽换”的策略，尽最大可能避免提前大选。这种做法虽然体现出了保守党对民意的关注和反馈，但没有经历过大选的首相在英国选民心里的合法性都很低。何况苏纳克是在没有竞争对手的情况下自动当选的，且他的政策偏向干预，与保守党的意识形态有一定差距。虽然从保守党上层的角度来看，尽快选出新首相可以让国家事务回归正轨，团结党员，但可能就连保守党党员都会质疑苏纳克赢得太轻松。7月进行的保守党领导人改选表明，保守党党员对于首相的意识形态的关注大于对其个人能力的关注，这也是特拉斯会被选上台的重要前提。而保守党党员的看法则刚好相反。此轮党内领导人选举将参选门槛提高到100位议员提名，几乎就是为了“保送”苏纳克当选，避免他在党员投票的环节再度折戟。

目前被保守党认定为有能力和凝聚力的苏纳克是不小保守党的“大救星”？抑或是不小心开启提前大选的“上帝之手”？还是单纯为了苏纳克回来收拾烂摊子？虽然此次支持苏纳克的保守党议员们表示对他有信心，但他们好像忘记了如今英国高通胀的根源之一，就是苏纳克在疫情时期身为财政大臣提出的补贴政策。在今年夏季之前，苏纳克本有足够多的机会来采取措施，尽可能降低英国经济在第四季度衰退的程度，但他当时并没有力挽狂澜，反而促成了约翰逊下台，对政坛动荡推波助澜。

即便苏纳克找到了解决困境的方法，英国选民们也不见得领情。以英国目前民生危机的程度而言，相关措施若能生效，也要在半年以后才能看到。如果半年内民怨沸腾，保守党上层是否打算继续执行“应换尽换”的方案，还是干脆放手大选，通过暂时下野来甩掉烫手山芋？毕竟，曾经在2007至2008年欧债危机中采取有效措施而尚未体会到经济复苏给工党带去的荣耀，就被2010年的大选匆匆断送了自己的首相生涯，让继任者卡梅伦和保守党成为了那场危机的救世主，并给英国人民带来了“脱欧”公投。



澳大利亚开始对美“战略松绑”？



陈弘 华东师范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

10月18日，澳大利亚外交部长黄英贤发布了一份媒体通告，声明从即日起，澳大利亚政府推翻上届莫里森政府将西耶路撒冷作为以色列首都的决定，恢复澳大利亚在此前长期持有的立场，即耶路撒冷的最终地位应当由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民通过和平方式进行协商来决定，坚持主张“两国方案”。

这是澳大利亚新政府上台后，第一次公开与美国政策相左。而这意味着什么？

当年决定为博私利

耶路撒冷地位问题是巴以冲突最主要的症结之一。可是2017年12月6日，为回报和进一步拉拢美国部分亲以色列的选民，时任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15天后，联合国大会以压倒性多数通过决议，认定任何宣称改变耶路撒冷地位的决定和行动“无效”。

然而，美国无视联合国的决议，美国驻耶路撒冷大使馆于2018年5月14日开馆。7个月后，时任澳大利亚总理莫里森“跟风”宣布澳大利亚承认西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

莫里森“跟风”主要出于国内和国际两个动机。在国内方面，当时悉尼的温特沃斯选区正在进行联邦议会议员的补选。温特沃斯选区中犹太裔人口较多，而莫里森为该选区提名的正是前澳大利亚驻以色列

大使戴夫·夏尔玛。在选举的紧要关头匆忙宣布事关西耶路撒冷地位的决定，莫里森明显是出于党派之争的政治动机，为了强化澳大利亚自由党内莫里森所属的派系利益。

在国际方面，莫里森则希望借此向特朗普效忠，博取美国的好感。特朗普宣布关于耶路撒冷的决定之后，当时世界上支持这一决定的只有危地马拉和科索沃。在莫里森看来，能在这个“关键时刻”为特朗普送上一场“及时雨”，势必能够换得华盛顿的青睐。而他的“一片好心”换来的却是阿拉伯世界以及澳大利亚的邻国、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印尼的猛烈抨击。甚至，此举也没有博得以色列方面的欢心。因为以色列主张拥有整个耶路撒冷，而不只是西耶路撒冷。

如今动作耐人寻味

如今，澳大利亚新政府在耶路

撒冷地位问题上“不再跟风”，一方面是为了兑现竞选期间的承诺。目前，澳大利亚国内的穆斯林人口为65万，新当选的工党政府自然不愿食言，甚至更希望借这个动作最大程度地争取他们的支持。

另一方面，澳大利亚新政府的内政外交也逐渐显露出改变之意。在外交上，阿尔巴内塞政府展现出的积极主动姿态甚至有些出乎人们意外，不但在周边南太岛国接连出访，更是远赴欧洲、美国和日本参与国际会议和重大国际活动。

虽然从整体来看，目前澳大利亚的对外政策仍与美国的“印太战略”紧密对接。但堪培拉似乎也流露出些许与美国战略“松绑”的迹象。阿尔巴内塞政府在耶路撒冷问题上的动作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美以关系是美国外交政策的关键基石之一。在耶路撒冷定位的问题上与美国公开分道扬镳，澳大利

亚的外交政策是否能够就此走向更大的独立性？这显然耐人寻味。

自2017年年中以来，当时的澳大利亚政府为呼应美国的“印太战略”，不遗余力地跳到遏华反华战线的前沿，令原本互惠互利的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遭到了严重破坏，两国关系降至建交以来的最低点。阿尔巴内塞政府上台以来，中澳间的紧张关系开始发生松动，两国恢复了部长级会谈。但也需要看到，一些澳大利亚政客近来依旧在渲染所谓“威胁”，甘愿充当美国的“马前卒”。

中方已明确表示，希望澳方能理性看待中国以及中国的和平发展，本着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和中方相向而行，使两国关系回归正轨。而澳大利亚方面是否能够以独立自主外交为原则，采取切实行动改善对华关系，国际社会也拭目以待。